

# 重访维多利亚时代：《法国中尉的女人》与《占有》比较研究

俞越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中国·福建 福州 350000

**摘要：**新维多利亚小说作为 20 世纪下半叶兴起的重要文学流派，致力于在当代语境下重新审视和书写维多利亚时代。约翰·福尔斯的《法国中尉的女人》与 A.S.拜厄特的《占有》均是极具代表性的新维多利亚小说。拜厄特本人公开坦言，《占有》的创作灵感源自《法国中尉的女人》。本文旨在从叙事策略、人物塑造和历史观的演变三个角度，对这两部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探讨新维多利亚小说如何从后现代的解构走向对历史的深层对话。

**关键词：**新维多利亚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占有》

## Revisiting the Victorian Era: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nd *Possession*

Yu Yu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Fujian Fuzhou 350000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literary genre emerging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neo-Victorian fiction is committed to re-examining and recreating the Victorian Age against contemporary contexts. John Fowles'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and A. S. Byatt's *Possession* rank among the most exemplary works of neo-Victorian fiction. Byatt has explicitly acknowledged that she drew creative inspiration for writing *Possession* from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two novels from three dimensions: narrative strategies, character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historical outlooks. It further explores how neo-Victorian fiction shifts from postmodern deconstruction toward in-depth dialogue with history.

**Keywords:** Neo-Victorian fiction; *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 *Possession*

### 0 引言

新维多利亚小说（Neo-Victorian Fiction）兴起于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指以维多利亚时代为历史背景或书写对象的当代历史小说。当时英国社会掀起一阵回望维多利亚时期的文化热潮，这类作品依托小说文本来反思、质疑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化特质、历史与时代风貌。该术语最早由席勒在 1997 年提出，此后逐渐取代“后维多利亚小说”“回溯维多利亚小说”等称谓，得到学界广泛认可。

由于这类作品书写历史时始终带有一种自我指涉的后现代意识，它们也被归入新历史小说范畴，即琳达·哈琴（Linda Hutcheon）所说的“历史编撰元小说”（historiographic metafiction）（金冰，2022：120）。萨莉·沙特尔沃斯等批评家在此基础上将“新维多利亚小说”划分为三类（2001：148-150）。其中，一类以《法国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为代表，作者模仿维多利亚文风，讲述一段发生在 19 世纪的虚构故事。

一类则以《占有》（*Possession*）等小说为代表，通过叙事搭建历史与现实双重时空维度，对当下生活的反思与对历史真相的追寻相互交织。对比两部作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代作家在处理历史题材时的方法演变。

### 1 叙事手法：元小说叙事的解构与双线叙事的重构

两部小说都拒绝了传统维多利亚小说的线性叙事和全知全能的上帝视角，但其切入点各有侧重。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采用了强烈的“元小说”（Metafiction）策略，即作者直接闯入叙事来解构叙事权威。在前十二章，通过戏仿维多利亚传统小说，福尔斯采用全知全能叙事视角，讲述一段维多利亚绅士查尔斯与神秘底层女性萨拉的爱情故事。但在第十三章，福尔斯突然跳出故事，向读者坦白这些人物仅仅是他脑海中的虚构，并以现代视角对这套仿维多利亚文本进行重新审视与评判。

小说开篇，全知叙事者缓慢而自信地铺陈故事全景，

比如 1867 年莱姆镇的地理风貌、气候环境,以及主人公所处时代的社会风尚与政治格局。叙事者隐于文本之外,却如上帝般洞悉一切。福尔斯刻意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语言,细致考证当时民众的衣着与风俗,在行文中穿插真实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但作者在编织整个虚构情节的过程里频繁跳出,打断故事进程,对叙事行为本身展开直接点评。例如第十二章,叙事讲完萨拉因在韦尔康芒斯公地散步遭波尔坦尼太太斥责,心碎落泪甚至想从窗边投海自尽后,元叙事者突然发问:“萨拉是谁?她从何而来?”叙事者在讲述百年前往事时,视角也会骤然切回 20 世纪,飞机、雷达、原子弹等现代事物突兀闯入故事,萨特、弗洛伊德等 20 世纪思想家及其理论不断穿插于叙事,用以解读主人公的行为与内心(李丹,2010:90)。福尔斯不仅打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第四堵墙”,还为小说提供了三个不同的结局。第一种是查尔斯选择迎娶富家小姐欧内斯蒂娜的传统结局。第二种是查尔斯冲破社会伦理和世俗桎梏,历经磨难寻回萨拉,二人与女儿幸福相守的浪漫结局。第三种是查尔斯找到萨拉,却遭萨拉拒绝,萨拉获得真正独立的新时代结局。这种多重结局剥夺了作者垄断真相的权力,迫使读者参与到文本的建构中,体现了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解构特征。

拜厄特认可福尔斯“小说套维多利亚小说”的写法,称赞其巧妙融合现实主义与实验主义。但她认为《法国中尉的女人》多重结局削弱阅读美感——多重结局无法呈现多重平行故事,读者无法将后两种结局视作第一种的真实替代,每一种结局都相互排斥,整部小说沦为缺乏真实质感的纸房子。这种多重结局无法带给读者叙事连贯、封闭式结局独有的阅读沉浸感(2002:174)。

而拜厄特称《占有》是一部兼具自我意识与可读性的小说。一方面,她铺展情节曲折、雅俗共赏的完整爱情传奇;另一方面,她依托嵌套文本、双线叙事等元小说手法,形成语言、小说虚构本质的自我反思。身为文学批评家的拜厄特,娴熟地将 20 世纪各类文论,如新批评、解构主义、传记研究、精神分析女性主义融入叙事,从多元视角评判维多利亚历史与人物。正如杰伊·帕里尼评价,“《占有》几乎穷尽英语小说所有叙事技巧供读者审视,却自始至终不失阅读乐趣”(1990:9)。《占有》中的当代主角多为高校文学研究者。拜厄特以戏谑讽刺的笔调,展现这群学者如何被学术研究“占有”人生,以及他们看待虚构文本的方式。莫德与罗兰交谈,论及阿什与拉莫特看待世界的方式,罗兰不由得感慨:“你难道不曾觉得,我们的种种

隐喻吞噬了整个世界吗?”莫德随即举例回应,就像莱奥诺拉·斯特恩惯于以女性躯体解读整片大地,在她的阐释体系里,万物皆是语言(Byatt,2000:275-276)。通过小说中的学者之口,拜厄特暗示了语言的自我指涉给她创作带来的困扰。

拜厄特还通过复杂的双线叙事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来进行文本重构。小说在现代学者罗兰与莫德的学术考证与维多利亚诗人阿什与拉莫特的隐秘恋情之间交替进行。罗兰与莫德起初陷入学术瓶颈并存在情感疏离的问题,在联合考据的过程中逐步还原历史真相,在揭开阿什与拉莫特的隐秘恋情的同时,彼此也滋生情愫。《占有》的互文性集中体现为对维多利亚诗歌、书信、日记的仿作。重构历史的过程中,拜厄特亲手创作虚构维多利亚诗人的诗作、情书、人物日记。这些仿维多利亚文体的虚构文献拼贴在现代叙事之中,赋予文本更强的历史真实感与可信度,读者与现代学者一起在这些文本碎片中寻找真相。《占有》的叙事策略不再仅仅是为了颠覆,而是为了在过去与现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建立一种迷宫般的对应关系。

## 2 人物塑造:女性个体的突围与主体性的重建

女性形象是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核心书写对象,两部作品均聚焦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生存困境与自我觉醒。它们突破了传统维多利亚小说中女性温顺、依附的刻板形象,塑造出超越时代局限的具有反叛意识和主体性的新女性,但二者的女性人物塑造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法国中尉的女人》最核心的突破就是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大众对“堕落女性”的固化偏见。在小说中,女主角萨拉被莱姆镇的居民肆意诟病,被冠以“法国中尉的妓女”这一极具羞辱性的称号。在维多利亚时代僵化的道德认知里,这类被世俗贴上污点标签的女性,最终的结局只能是陷入自我否定,在困顿与忏悔中妥协认命。但萨拉完全跳出了这套世俗既定的人生剧本。她身上所谓的“堕落”,从来不是被动遭遇的命运悲剧,而是她主动为自己挑选的生存面具。作为一名孤独的反叛者,萨拉的抗争不属于群体性的反抗运动,而是一场纯粹的、个体化的自我突围。

在维多利亚时代严苛的道德体系与礼教束缚中,女性被禁锢在贞洁规范和家庭框架之内,完全丧失自主选择权。尤其是出身普通却接受过教育的底层女性,在绝对主导的父权体系下,人生路径早已被框定。她们只能依附于男性,成为婚姻与家庭的附属品,或者在层层压抑的规训中消磨自我、黯淡落幕。萨拉敏锐地意识到,想要逃离被物化、

被交易的维多利亚婚姻体系，挣脱世俗对女性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捆绑，唯一的方式就是主动游离在主流道德秩序之外，成为社会语境里的边缘人。因此，她并未向世俗规训妥协，反而坦然接纳外界赋予自己的“不道德”标签，主动将自己置于社会边缘。萨拉主动杜撰了被法国中尉抛弃的身世传闻，面对查尔斯递来的拯救机会与世俗婚姻，她也始终选择拒绝。明明可以借着这段婚恋实现阶层跨越、过上安稳日子，她却毅然选择抽身离开，依靠自身完成精神层面的自救。

在福尔斯笔下，萨拉身上旁人眼中的品行败坏，根本算不上道德滑坡，反倒成了她反抗维多利亚社会伪善礼教、争夺个体选择权的一种手段。她十分清楚男性目光里的怜悯与审视，顺势借助这份他人投射过来的同情，一步步攒下底气，最终做到思想独立，融入拉斐尔前派的艺术家圈层，成长为具有先锋意识的新式女性。不过，萨拉的自我觉醒带有极强的个人孤独色彩，有着明显的局限性。她的抗争只是一场个体突围，没能撼动整个社会固有的性别格局，更无力扭转当时全体女性普遍受束缚的生存现状，仅仅完成了属于自己一个人的精神解放。从这一点也能真切看出，身处维多利亚时期的普通底层女性想要萌生自我意识、谋求精神突围，始终困在时代夹缝之中，前路充满被动与艰难。

在《占有》中，拜厄特借助两代女性形象，展现出女性主体意识循序渐进的发展轨迹，完成了女性价值跨时代的完整重构。作者分别刻画了维多利亚时代女诗人拉莫特，以及身处当下、深耕女性研究的学者莫德，形成一组互文对照的女性样本。维多利亚女诗人拉莫特聪慧独立、才华横溢，在男性主导的文学界坚守自我，依靠诗歌写作搭建起属于自己的精神空间。即便在和艾什相恋的过程里，她一度陷入情绪内耗，不断在情感之中摇摆煎熬，却从来没有彻底丢掉独立人格，既不愿依附男性生存，也不肯顺着世俗偏见妥协，冲破了当时社会给女性划定的种种身份牢笼。反观当代学者莫德，本身就是现代独立女性的典型缩影，专业功底扎实，遇事冷静克制。最开始的她被功利化的科研思维裹挟，习惯用一套刻板的批评理论包裹自己，刻意压抑内心真实情绪，抗拒投入亲密关系。可随着一步步梳理、探寻拉摩特尘封一生的爱恨过往，她慢慢卸下内心防备，不再偏执地只用理性看待一切，慢慢找到了理智与情感之间的平衡点。

拜厄特借着两位女性跨越时空的隐秘联结，梳理出一条清晰的女性成长路径。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只能选择隐

于幕后，在隐忍之中悄悄守住本心、艰难突围；后世女性则在回望前辈人生的过程里完成自我醒悟，找准属于自身的价值方向。如果拿来和《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萨拉略显孤立、近乎理想化的个人抗对比就能发现，拜厄特的女性书写更具系统性与递进性，对女性困境的描写更加细腻、现实，字里行间饱含对女性主体性建构的深层人文关怀。

### 3 历史书写：解构历史虚妄与重构历史温度

两部作品均立足后现代历史观，对维多利亚历史进行改写和反思的同时，否定了传统正史的绝对性与权威性。福尔斯侧重解构历史、揭露虚妄，而拜厄特侧重还原细节、重构温度，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书写方式。

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福尔斯对官方正统历史始终保持着审慎的质疑态度，并挑战了传统正史不容置喙的权威地位。以往的传统历史叙事，大多将叙述重心放在皇室更迭、贵族发展与重大社会变革等宏大事件上，一味渲染维多利亚时代的盛世繁华与文明进步，却掩盖了底层个体的苦难与挣扎。福尔斯跳出了正史的宏大叙事框架，将视角聚焦于小人物的命运与内心抉择上。他以萨拉游离于世俗之外的边缘人生、以及查尔斯在礼教与本心之间反复拉扯的道德挣扎为切入点，层层撕开维多利亚时代光鲜繁荣的外在表象，深刻揭露了盛世背后隐藏的道德虚伪、阶级压迫与人性压抑。同时，小说的开放式结局否定了历史的必然性与唯一性，证明所谓的历史定论不过是叙事者的主观建构，历史本身充满不确定性与偶然性。福尔斯的历史书写打破了大众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固化认知，撕下时代文明的虚伪面具。

不过，福尔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态度带有明显的来自 20 世纪的优越感与批判性。福尔斯在《法国中尉的女人》中译本前言中指出：“十九世纪的英国是一个极富侵略性的国家，它不仅对外不讲自由，对内亦无自由可谈。实际上，我的小说的主题就是写在这样一个毫无自由的社会里，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是怎样获得自由的。”书中其余核心角色总是用教化规训、道德排斥、宗教感化、强权约束等多种方式，迫使萨拉重新融入维多利亚社会公认的价值秩序。显然，“不自由”是福尔斯对维多利亚时代的基本界定，而这一偏见与他所处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主流思想观念息息相关。在激进反叛的 60 年代的映照下，维多利亚时期不仅表现为道德虚伪，还成为了阻碍自由的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占有》则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还原历史的人文温度。拜厄特曾言：“我本人的目的更多地在于从诸如福尔斯等作家的贬损性戏仿中将那些思想深刻复杂的维多利亚人拯救

出来”(2002:79)。在这里,拜厄特指出了她所认为的其他当代作家对维多利亚时期历史人物的误解与滥用。拜厄特拒绝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评判维多利亚时期历史人物,而是通过大量真实的时代文本——诗歌、书信、日记、学术手稿,细致还原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氛围、社会风貌与人文情怀。在传统历史叙事中,维多利亚女性的情感、思想与创作大多被历史淹没,成为男性历史的附属品。拜厄特通过挖掘小众诗人的隐秘人生,填补了正史的空白,让被遮蔽的女性历史、个体历史重见天日。小说通过两位学者的探索过程证明,历史不是冰冷的文字记载,而是由无数个体的情感、挣扎与坚守构成的鲜活整体。而最后还有开放式的留白,作者增设了后记 1868,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者向读者描绘一段往事:阿什与一位小女孩相遇。这场会面发生在阿什与拉莫特断联九年后,阿什离世二十一年前。这段文字实则是对传统叙事模式的批判:部分历史事件未留下任何文字记录,因此一切历史叙事都存在不可规避的局限性(王艳萍,2023:135)。作者在解构宏大正史局限性的同时,重构了微观、鲜活、有温度的民间历史与个体历史,赋予历史全新的人文内涵。

#### 4 结语

从《法国中尉的女人》到《占有》,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新维多利亚小说的发展轨迹。两部小说作为新维多利亚小说的标杆之作,立足同一时代语境,以差异化的艺术表达诠释了新维多利亚文学的精神内核。在叙事层面,福尔斯以元叙事解构传统范式,拜厄特以双线叙事重

构叙事结构;在人物层面,前者塑造了孤独突围的觉醒个体,后者构建了递进成长的女性群像;在历史层面,前者以解构揭露历史虚妄,后者以重构还原历史温度。两部小说从不同的维度证明,我们不断地重写维多利亚时代,并非出于单纯的怀旧,而是为了在历史的镜像中,确立当代人自身的文化身份与精神坐标。

#### 参考文献:

- [1] 金冰. 西方文论关键词: 新维多利亚小说[J]. 外国文学, 2022(4): 119-128.
- [2] 李丹. 从“历史编撰元小说”的角度看《法国中尉的女人》[J]. 外国文学研究, 2010, 32(2): 89-96.
- [3] 王艳萍. 叙事欲望与情节编织——论拜厄特小说《占有》的历史叙事[J]. 国外文学, 2023(2): 131-140.
- [4] Byatt A S. On histories and stories: Selected essays[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5] Byatt A S. Possession[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 [6] Shiller D. The redemptive past in the neo-Victorian novel[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7, 29(4): 538-560.
- [7] Shuttleworth S. Writing Natural History: "Morpho Eugenia"[J].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WORLD LITERATURE, 2001, 110: 147-160.

作者简介: 俞越(2001-), 女, 汉族, 浙江金华人, 福建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研究生, 邮箱: 2130409195@qq.com。